

要塞優婆夷
大歡喜信
世間天人
阿羅漢
離開佛所

上剛般若波羅蜜

真言

跋帝 鉢羅若 鉢羅蜜多曳

伊哩帝 伊先哩 式嚧馱 毗舍耶 毗舍耶

安婆訶

辛德勇 著 中国印刷史研究



中国印刷史研究

辛德勇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印刷史研究 / 辛德勇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11

ISBN 978-7-108-05620-7

I. ①中… II. ①辛… III. ①印刷史—研究—中国
IV. ① TS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0590 号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与活字印刷发展综合研究”
(项目批准号: 10JJD770012) 的成果

特邀编辑 孙晓林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王军丽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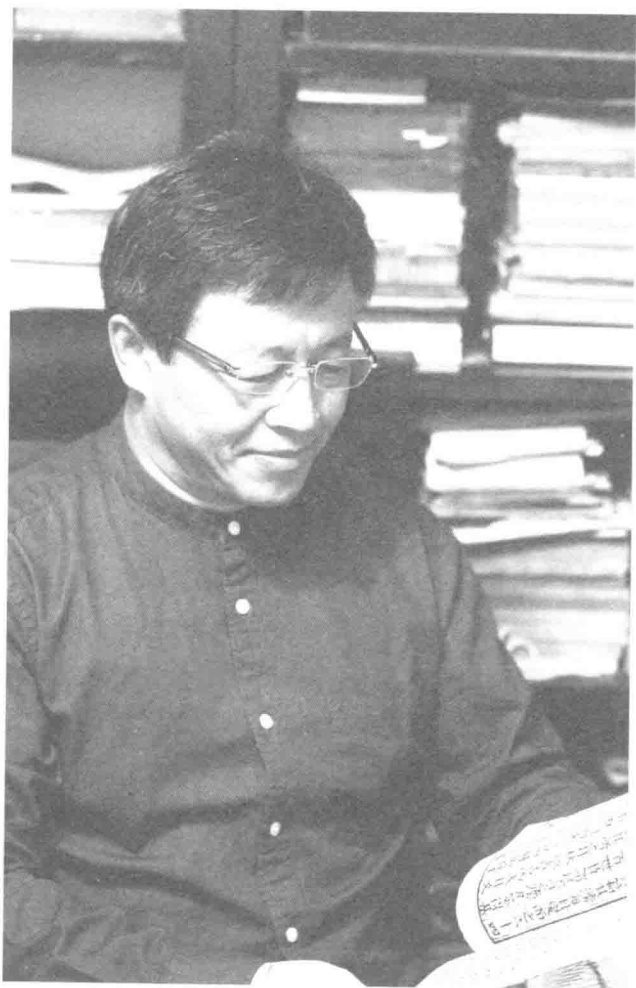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5

字 数 301 千字 图 51 幅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54.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辛德勇

前 言

我本来的专业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近年客串作一些中国印刷史的研究，是基于如下两个因缘：一是从读硕士课程时起，就有幸亲炙于黄永年先生，先生手把手地教给我很多具体、实在的知识以及历史地看待版本刻史、印刷史现象的研究方法，这为我研治古籍版本和印刷史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二是从2004年起，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书，滥竽充数，拿老师黄永年先生的讲义给学生讲授版本知识，备课过程中对一些传统的说法产生疑惑，这些疑惑，也就成为我不得不研究的问题。来到北大教书，一转眼整整十年了。这部书稿，就是这十年间我在中国古代印刷史方面最主要的研究成果。

在从事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我一直比较注重将具体的印刷现象和事实，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紧密结合在一起。例如，探寻雕版印刷术产生的时间，我就更为关注导致印刷术产生的关键性因素到底是什么。我的结论是，佛教密宗信仰，是雕版印刷术产生最重要同时也是最直接的驱动力，因而雕版印刷术的产生时间，不当早于密宗在唐代全面兴盛的开元年间。再如，关于唐人“模勒”元稹和白居易的诗篇售卖一事，以往绝大多数学者都将其认作雕版印刷的实例；即使个别心存审慎、对此持有不同看法的学者，也没有关注肯定抑或否定此说，对中国早期印刷的发展历史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则从印刷术产生于佛教信仰者的需求这一角度出发，通过综合分析中国早期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在世俗社会的传播扩散过程，指

出并世之人雕版印刷元稹、白居易诗篇的不合理性。又如，关于明代从弘治、正德年间起，在以无锡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及其毗邻地区，是否曾经有过繁盛的铜活字印书这一问题，我从明代铜资源的匮乏、朝廷对民间用铜的严厉限制、铜活字印书因成本过于昂贵而违背常理、明人的刻铜技术尚不具备大规模雕制铜字的可能等诸多条件进行分析，认定明代从未有过铜活字印书。我希望透过这样的视角，能够对中国印刷史的认识有所深化。

另一方面，我在研究中还比较注重尽可能以开阔的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印刷史的成就。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其研究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探明真相。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国度，在国内学者的印刷史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刻意强调和凸显中国优越性的倾向。比如，在研究印刷术起源问题时，有相当一批人都是以捍卫中国人的发明权作为研究目的。像这样预设结论来做“研究”，当然难以取得深入、准确的认识。我虽然不赞成朝鲜半岛率先使用印刷术的观点，但却认同藤田丰八、秃氏祐祥和向达这几位学者很早就提出的看法——中国的印刷术，是在印度捺印佛像技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换句话说来说，即印刷术源出于印度。同时我还认为，朝鲜半岛的铜活字印书技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大大领先于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朝鲜半岛在金属活字印刷方面的领先权是合理的，世人应该予以尊重。

本着这样的视角和态度，今后我还会再做一些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其中早已考虑得比较成熟的题目，如明代中后期活字印刷的一度兴盛在中国印刷史上的意义、铜活字印刷在中国产生的时间及其历史背景等。诚恳地希望读者对这部书中存在的问题予以指教，以帮助我改进下一步的研究。

2014年11月2日记

目 录

前 言 1

上 篇 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

- 一 传世文献有关早期雕版印刷的确切记载 3
- 二 印刷术起源于唐代以前诸说辨析 12
- 三 论唐贞观说之不足信据 117
- 四 辨析唐高宗时期所谓雕版印刷史事 145
- 五 论武周时期有关雕版印刷的物证、书证与想象 159
- 六 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秘藏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188
- 七 佛像、梵文陀罗尼的捺印与雕版印刷技术的印度渊源 235
- 八 密教在唐朝的全面兴盛与印刷术的出现 256

中 篇 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

——兼论中国早期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在世俗社会的传播扩散过程

- 一 唐人“模勒”元白诗为雕版印刷说的由来 289
- 二 “模勒”一词的真实语义 297
- 三 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在世俗社会的传播扩散过程与元白流行诗篇的复制方式 309

下 篇 论所谓明铜活字印书于史初无征验

——附论明代的金属活字印本

- 一 明铜活字本说的由来 327
- 二 视“活字铜板”或“铜板活字”为铜活字印刷于理未安 339
- 三 书籍活字印刷史上的铜板法 349
- 四 “铜字板”与铜活字无涉 358
- 五 其他所谓明铜活字记载辨析 368
- 六 华燧之前中国亦从无铜活字印书的记载 377
- 七 明代之金属活字印书 382

结 语 395

上 篇

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 社会原因及其时间

书籍印刷术是中国古代贡献于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一，国人对此，无不津津乐道。然而，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对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却还没有能够做出比较具体并且合乎情理的说明，而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同样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从总体上看，当前域外学者所做论述，情况大体相似，认识也不够明晰。

事实上，现代学者中较早探索这一问题的人，如藤田丰八、向达、秃氏祐祥诸人，本来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解析路径，并且已经阐明其基本发展脉络，只是后之学人未能循其轨辙，更进一步，以致治丝益棼，反而去其真相渐行渐远。

有鉴于此，特撰述此文，尝试予以论证，以求返本归真，揭示历史原貌。

一 传世文献有关早期雕版印刷的确切记载

前人论述印刷术起源问题，首先更为关注它的产生时间。印刷术具体出现在什么时候，虽然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至五代后唐冯道在洛阳刊印经书以后，始在北宋时期全面普及于中国，即如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云“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1]。对于这一点，应该没有多大分歧，至少没有什么人能够举述出与此相反的证据。然而，自宋代起方始广泛应用的雕版印刷术，其最初发明的时间究竟能够向前追溯到什么年代，学者们的看法，却有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同许多人未能很好地理解沈括上述记载有关。

在分析《梦溪笔谈》这段记述的时候，特别需要注意沈括是北宋神宗时人，他很容易看到大量制作于唐代和唐代以前的书籍。因此，沈氏所说“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并不只是出自对相关历史记载的推理判断，更应该是他通过手摩目验，对比当时所流通唐宋间典籍之后写下的实况记录。盖唐代虽然已经有印本行世，但范围和数量还相当有限，宋人所见李唐一朝及其以前的书籍，基本上还都是手书的写本。

较沈括行年稍晚之两宋间人邵博，即因在早期印刷书籍当中，只

[1] 宋沈括《梦溪笔谈》（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蝴蝶装影印元大德九年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卷一八，页15a。



元大德九年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梦溪笔谈》(文物出版社1975年限量编号原大影印)

是在其“曾大父遗书”里面见到有冯道“长兴年刻本”，乃径谓之曰“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写本”^[1]。基于同样原因，约略与邵博同时人朱翌，亦谓“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2]；同时人叶梦得也有相同的说法^[3]，而宋代更有代表性的著述，则是王应麟《玉海》引述的“国史艺文志”，使用与朱翌一模一样的词句，称“唐末益州始有墨板”^[4]，这样的说法，应是基于大量官方藏书的实际制作形式，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身历靖康离乱的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以富有藏书且多珍本秘籍而著称于世，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一

[1] 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五,页36。

[2] 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重印民国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原刻初印《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下,页682。

[3]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八,页116。

[4]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江安傅氏双鉴楼藏元刊本)卷八,页20a。

文中记述说，当建炎南渡之际，“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所谓“书之重大印本者”与夫“书之监本者”，显然也只能是本朝当时的印本，故李清照下文记述其留存行篋未忍丢弃的唐人著述，若李、杜、韩、柳诸名家的集子，都只是写本，决然没有提及唐代的刻本^[1]。再往后，宋元间人罗璧对此也有清楚的叙述：“唐末书犹未有模印，多是传写，故古人书不多而精审，作册亦不解线缝，只叠纸成卷后，以幅纸概粘之〔犹今佛老经〕，其后稍作册子。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始令国子监田敏校六经，板行之，世方知镌甚便。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弛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2]罗氏在这里不仅谈到书籍文字内容的制作方式是“模印”（亦即雕版印刷）抑或“传写”（亦即手书），而且还谈到书籍装帧形式在唐宋之间与此相伴随所发生的明显变化，自然应当是出自实际观察。敦煌石窟中遗存的唐人实用典籍，绝大多数都是手写成篇而罕见雕版印本，就是对上述记载最好的证明。

由印刷术全面普及的北宋时期向上追溯到“版印书籍……尚未盛为之”的唐代，让我们再来看看，唐代使用雕版技术来印刷书籍的直接记载究竟出现于何时。关于这一问题，过去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其中很多观点，还将唐代使用雕版技术的纪事完全等同于中国应用雕版印刷技术的最早记载，需要在下面各节逐一分析。这里首先来确认一下得到绝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可靠记载，最早是出现于什么时候。

唐穆宗长庆四年（825年），元稹为好友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撰写序文，曾经提到“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

[1] 宋赵明诚《金石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卷末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页561—563。

[2] 宋罗璧《识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成书得书难”条，页4b。

之中”^[1]。至迟从明朝末年人胡震亨开始，就将此“模勒”元、白两人诗作一事，视作唐朝已盛行雕版印刷的例证。这一说法，在清代乾隆年间，得到四库馆臣和赵翼的认同。晚近以来的学者，则从日人岛田翰，到叶德辉、王国维，亦均承袭此说，谓元稹所说“模勒”，“自非镂板不可”^[2]。基于叶、王两氏在中国版刻史研究领域的奠基者地位，后来中国学者论及这一问题，遂递相遵用其说，罕有异辞。

不过，也有一部分中外学者，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与中国学者向达等人，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只是由于这些学者没有深入展开论证，同时，利用外国学者的著述，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语言文字的障碍，大多数中国学者对此未能予以充分关注。针对这两种不同观点，我曾撰写文章，具体加以辨析，指出元稹所说“模勒”的本义，实际上等同于“模写”或者“摹写”，本来与雕版印刷毫无关系^[3]。

需要说明的是，伴随着近年刻意寻求“新材料”学风的日益炽盛，不断有人偏倚孤本秘籍以事“发现”。在这当中，有一名陈舛者，对日本镰仓末期（大致相当于中国元朝中期）辗转写录的一份“天下孤本”书目《二中历》（此书内容是从《掌中历》和《怀中历》两部书籍中摘录出来的，其中《怀中历》的著作年代已经晚至北宋末期的宣和四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看到这份在所谓“经史历”（出自《掌中历》）名目之下开列的一份书目——“书史卷数”，在一百零三部基本经史子集各类典籍名目之下标注有“已上唐摺本注之”识语，而日本复多以“摺本”表示刻本，陈氏便把这些书籍统统理解为“唐末五代刻本”，宣称这一书目“极有可能就是一份保留在平安中后期大学寮的‘唐摺本’——唐末五代刻本书目。……极有可能是一把为

[1] 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五一，页554—555。

[2] 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上海书店，1983，影印《王国维遗书》本）卷首王氏自序，页353。

[3] 别详拙文《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兼论中国早期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在世俗社会的传播扩散过程》，刊《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页36—54。今编为本书中篇。

重新评价五代出版事业，甚至五代的文化政策的一把重要的钥匙（德勇案：此句不通，‘钥匙’多了‘一把’，有明显语病，但检核其原刊之处与编入文集者都是如此，似非手民误植所致），希望今后能发现更多的新史料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一层次的议论”^[1]。

检视《二中历》原书可知^[2]，在这些所谓“唐摺本”书籍当中，首列除了《孟子》以外的儒家“十二经”和《老子》、《庄子》^[3]，继之便是包括迄至《隋书》为止的所有纪传体“正史”，还有《说文》、《经典释文》等文字训诂书籍，包括《老子》、《庄子》（与上述附列于经书之后者重出）、《孟子》、《白虎通》、《盐铁论》、《颜氏家训》、《吴越春秋》在内的先秦汉魏南北朝以至唐代的诸子杂史等，以及《初学记》、《六帖》等类书，唐代以前的重要典籍，几乎应有尽有。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当中甚至还包括篇幅多达一千卷之巨的《文馆词林》。假若事实果真如此，这就不仅仅是五代出版事业和五代文化史的问题了，整个中国书籍史乃至文化史恐怕都需要重新评估，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重大发现。但正如陈翀所指出的那样，专门研究过这一文献的日本著名文献学家川濑一马，却完全没有这样看待这份书目，

[1] 陈翀《试探〈经史历〉所见唐末五代大规模刻书之可能性》，原题《三善康为撰〈经史历〉之文献价值叙略——兼论唐末五代大规模刻书之可能性》，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六辑（2010年），此据静永健、陈翀合著文集《汉籍东渐及日藏古文獻论考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43—72。

[2] 据日本育德财团在1937年按照原本装帧形式影印复制的《尊经阁丛刊》本《二中历》。此本一如原本，无页码标记。

[3] 案以《老子》、《庄子》与儒家“十二经”并列，是承自西晋以来迄至北宋时期以前的惯例，盖如四库馆臣在评议《经典释文》一书时所云：“其列《老》、《庄》于经典而不取《孟子》，颇不可解，盖北宋以前，《孟子》不列于经，而《老》、《庄》则自西晋以来为士大夫所推崇，（陆）德明生于陈季，犹沿六代之余波也。”说见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影印清浙江刻本）卷三三《经部·五经总目》，页270。又李唐宗室尊崇老子与道家，《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九《玄宗纪》（页213）载：“（开元）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老》、《庄》既已列入明经之科，与儒家经典并尊，自然会更受重视。又案《二中历》所开列书籍的称谓、卷次等显得比较杂乱，反映出前后不同时代的特征。例如，在此“书史卷数”项下，《老子》和《庄子》即前后重出，除了上述与“十二经”并列者之外，又被编排在各种子书之首。

其中的原因不难揣摩，这就是如此规模浩大的出版印刷，违背其他可信史料所记载的基本史实，特别是北宋初期官刻经史典籍，绝未有人提到过这批刻本。历史的发展，是有正常伦次的。文献记载若是严重背戾这样的伦次，就要反过来审视这一文献本身是否存在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解读出现了误差。

如上述引文所见，陈翀在阐述这份书目在中国出版史上的价值时，竟有意回避唐朝的问题而只说“五代”了，这显示出他也感觉到自己的解读与其他相关记载存在很严重的抵牾，所以才尽量使其延后一些，淡化唐朝，凸显五代。殊不知即使如此，仍然存在无法弥缝的罅漏。

譬如，这份书目中载录有“《后汉书》百廿卷”，这应该是以唐李贤等注范曄《后汉书》之九十卷纪传与萧梁刘昭注补之司马彪《续汉书》三十卷志书合编而成的卷数（案李贤等注本《后汉书》原编一百卷，见于《旧唐书·经籍志》著录^[1]）。《二中历》中，在陈翀所说的那份“唐摺本注之”书目之外，还具体开列有一些重要经子史书的篇目和卷次构成，其中载有“《后汉书》一百卷，范曄撰，皇太子臣贤注”，即属此书。需要说明的是，《二中历》具体开列的李贤注《后汉书》篇目，也间杂有“志三十卷”，但加入这一部分后“合百三十卷”，不仅与《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的李贤注本卷数相抵牾，而且还与后来正式合刻司马氏志于范曄书的一百二十卷本不符，应该是抄录者径随己意添上了司马彪《续汉书》志的部分，而此一百卷李贤注本乃合“十二帝后”之“帝纪十二卷”与“八十列传八十八卷”^[2]。《二

[1] 《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页1989。

[2] 案在《二中历》之“经史历”中具体开列的《后汉书》篇目和卷次构成之末，附记云：“总十二帝后，三十志，八十列传八十卷，合百三十卷，本百二十二卷。”如上所述，“合百三十卷”，是抄录者附入司马彪《续汉书》诸志后的卷数，而“本百二十二卷”的“本”应该是指别本《后汉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曄本，梁刻令刘昭注”，其中已经补入三十卷司马氏志。疑此“百二十二卷”本《后汉书》，便是这种刘昭注本，而传抄间讹“百二十五卷”为“百二十二卷”。

中历》中置于“唐摺本注之”之列的合编一百二十卷本，将李贤所注编作九十卷者，是恢复范晔《后汉书》纪传部分原来的卷数），而历史文献清楚记载，宋初太宗淳化五年和真宗景德二年两次雕印李贤等注《后汉书》的时候，都还没有加入司马彪《续汉志》的内容，直至宋真宗乾兴元年，国子监又一次重刊此书，始应从孙奭的请求，截取刘昭注本《后汉书》诸志补入李贤等人所注《后汉书》当中，将其一并刊行于世，从此才出现这种一百二十卷本《后汉书》^[1]。因此，这份书目中所著录的《后汉书》，假如确属刻本，只能梓行于宋真宗乾兴元年以后，而绝不会是什么“唐末五代刻本”^[2]。

基于这一情况，再考虑到这份目录实际书写的时间已经很晚，可知所谓“唐摺本”云云，绝不可能是用来标记书目所载典籍的制作形式。或许有人以为，就像今天日本书商习称中国刻本为“唐本”一样，“唐摺本”不过是表示“中国刻本”的意思而已。不过，即使是这样，仍然存在问题，在这份书目当中，有一些书，不管是在哪个朝代，都不大可能有刻本问世。例如《高祖实录》二十卷、《太宗实录》四十卷，这应该就是许敬宗等人奉敕编著的唐武德、贞观两朝的实录^[3]，但迄至清朝灭亡，历代历朝都没有雕版印刷实录的做法，即清初人潘耒所说“列朝实录，秘藏天府，士大夫罕得见”者也^[4]。事实

[1] 见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绍兴刻本《后汉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缩印洋装本）所附宋朝官牒，页1353。又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之《四笔》卷一“范晔汉志”条，页626。案刘昭是在注释范晔《后汉书》时，割取司马彪《续汉书》里的八志共三十卷，补在范晔《后汉书》之后，称作“后汉书志”，并“注以补之”（《后汉书》卷末附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2），《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三三《经籍志》二（页954）著录有“《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颉令刘昭注”，便是这种刘昭“注补”本。

[2] 案虽然唐代就已经有个别人取刘昭注补《续汉书》诸志与李贤注范晔书之本纪列传合写为一编，见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台北，广文书局，1981，据《古逸丛书》影印本）之《正史家》著录（页29），但当时编录的卷次为“百卅卷”，这应当是简单地把刘昭注补之三十卷《续汉书》诸志，抄附在李贤注范晔书一百卷原本的后面，与宋人合刻之一百二十卷本《后汉书》尚有明显差别。

[3] 《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二〇三《艺文志》二，页5088。

[4] 清潘耒《遂初堂文集》（清康熙刻本）卷六《国史考异序》，页6a。